

● 朱启财

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的理论和实际界定

9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与80年代相比，在改革环境、体制运行、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等方面都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特征，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和支付的社会代价也比80年代要大得多，然而，面对80年代的改革成就和现今的有利时机，我们又不得不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改革能通过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完善和对社会经济权利结构的配置组合来解放生产力。可是，改革步伐的快慢并不取决于人们主观愿望的随机程度，而是由社会经济关系的综合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并且改革步伐自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运行规律。因此，如何从理论和实际经济关系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步伐进行客观界定，是我们当前必须研究和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经济改革步伐：约束原则、宏观标准及影响因素

（一）约束原则

13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使我们对传统的经济运行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和现实的重新审视，同时，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加大对旧体制的改革来建立和拓展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的新型的经济运行制度，因而，经济改革步伐的快慢将直接反映新体制对旧体制的替代速度。由于旧体制在我国运行时期较长，影响很深，并且体制自身在运行时具有较大惯性，决定了我们对旧体制的改革和新体制的建立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为了保证整个改革过程的社会主义属性，改革步伐的快慢必须受制于下列基本原则：1. 巩固公有制原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不仅在本质上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要求，而且在资源配置和分配公平等方面具有私有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公有制作为我国经济的现实选择，是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任何削弱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行为都是决不允许的。2. 促进生产力发展原则。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我们之所以改革旧体制，是因为它从总体上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生产力标准”是贯穿整个改革过程的重要标准。由于在实际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改革行为都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例如，有的改革从局部看是促进了生产力，但从宏观上看却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和平衡；有的改革措施从短期看能促进生产力，但从长期均衡上却妨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下一轮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从生产力的层次关系、整体结构及长期动态发展角度来把握改革步伐的快慢与协调。3. 中国特色原则。任何改革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特别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征来研讨一切改革方案，这就要求改革的步伐既不能过快过急，又要在社会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在吸收外国的经验模式时必须根据我国实际进行实践试验、总结和推广或扬弃，这是由于各国的经济关系不同，同一经济机制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并非一样。4. 成本最小化原则。改革是一场广泛的社会性运动，是对旧体制的深刻革命，它需要有一个摸索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要承

担一定的成本，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损失代价、风险，甚至还有危机。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不顾风险而盲目“冲撞”，关键在于如何减少代价和风险。这就要求改革步伐的抉择要在坚持公有制、发展生产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则下，在讲究改革实效的基础上，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做到改革效益最大化和改革成本最小化间的协调。这是我们在改革的程序设计、宏观引导及微观执行方面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

（二）宏观标准

改革是相对于旧体制的僵化和低效率而言的，因而改革步伐快慢的宏观评判标准自然来自于经济运行的实际效果，我们以可观察的显示指标来反映：1. 经济增长速度与平衡关系。经济增长速度是从经济发展的总量变化上来表现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程度。改革的原始期望就是加速经济的增长，如果改革过程中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出现下降并延续相当时期，不仅社会公众感到惊讶，改革的设计者也会作出调整改革步伐的选择。从80年代的改革进程来看，改革步伐的每次加快都直接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反过来诱惑着人们加大改革份量。但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受制于社会供求的平衡关系，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过程中，总供求的相对平衡既是充分必要的经济条件，也是度量改革进展的重要基础，否则通货膨胀就可能导致改革的困难或失败，至少不能实现预期的理想目标。2. 结构优化与利益增长。现代经济发展不仅要求总量扩张，更重要的是质量改善。旧体制的严重弊端在于其结构失衡下的低效，因此改革的直接效果必须促进结构变动及其优化，通过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来实现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增长，尤其是人民生活的提高和改善。更为现实的是，消费者总是根据其收入增长水平及消费提高程度来切身感受和判断改革步伐的快慢。3. 市场发育及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力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与市场机制的引入存在同步合轨的特征，回顾80年代改革的每次进展几乎都是在市场发育方面进行某些突破。其实，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改革的基本取向。因此，市场对经济的吸纳程度和影响力是反映改革进展的现实标志。4. 新旧体制的替代频率。从体制的角度看，改革无非是两方面的行动，一是破除旧体制，二是建立新体制，即新体制对旧体制的替代，而这种替代的速度及其覆盖关系是度量改革步伐的最重要的标准。

（三）影响因素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增长和运行效率上的失灵；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的生产和消费上的超高速发展。内在的发展冲动和外在的赶超压力，形成了现实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紧迫性和不可逆转变，也正因如此，社会各个阶层都时刻关心着改革的步伐，并以此来评判社会的前进速度。从生产力机制看，社会主义国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因而唯有通过改革才能尽快地缩短这种落差。可是，改革的步伐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臆想，而是由主客观的多种因素所综合规定：1. 宏观主体的改革决心与把握水平。从我国的改革历程来看，每次新的改革浪潮的掀起往往都是与宏观主体的决心及其政策变动有关，并且改革也都是在宏观主体的直接设计、引导和调整中完成的，因此宏观主体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与把握水平，并由此而采取的改革决心及政策是影响改革进展的重要变量。2. 群众的实惠期望及其理解。改革的任务是要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群众也正是根据其实惠期望和实现程度来支持、理解改革的。如果群众在改革中得不到满意的实惠，他们便会不重视改革或持观望态度，从而也就直接影响宏观主体对改革措施的选择。3. 旧体制权利格局的刚性程度。经

济体制改革是通过权利格局的重新调整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所以它必然要冲击过去人们习惯的旧的权力配置和分配方式，包括触动“铁交椅”、“铁饭碗”和“大锅饭”。但旧的权利结构存在相当大的刚性，在新体制尚未发生作用或适应之前，过份地冲击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震荡，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局面。4. 理论准备及成熟状况。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经济改革是一场系统的社会性运动，更需要理论的超前性。成熟的科学理论不仅可以指导改革目标、方向及具体操作，而且还能解放人们的观念，消除落后意识对改革的阻碍。因此，改革步伐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的准备状况及成熟程度。5. 社会承受能力。每一项经济改革措施的出台必然会引起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变动，在这种变动中某些主体会受到暂时的利益损失，受损者对损失所能容忍的限度便是通常所指的“改革的承受力”。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进行以及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改革步伐的迈进必须在社会有承受能力的范围内进行。6. 国际环境的适应性。从改革步伐的函数关系来看，国际环境也许只是一个外在变量，但却是个非常重要而必须考虑的变量。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一个国家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适应，中国的改革也不例外。宽松、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仅为国内加快改革创造条件，而且我们可以广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和剩余资本来弥补国内的相对短缺。因此，中国应利用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积极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秩序，以便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

二、80年代的改革步伐与90年代的改革环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1979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拉开闸门的。这一改革的实质在于将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与土地的使用权直接结合，改变了传统体制中土地的经营权能与单个家庭相分离的格局；与此相配套，国家相继改变了原有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允许农民将部分剩余产品进入市场。产权分解和市场机制的引入构成了整个农村改革步伐的踏脚板，它直接冲击和瓦解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农村自然经济，使农业生产力发生了历史的跳跃；它彻底推翻了农业经济“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模式，从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引发了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和农民利益的成倍增加。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迈开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

在农村改革成功的背景下，1984年我国经济进入了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将企业推向市场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经济改革步伐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中国的城市经济长期以来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调控为手段而运行的。对市场的排斥和由此而形成的企业缺乏活力成为旧体制下企业运行的基本常态。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国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通过简政放权、减轻税负、缩小指令计划范围和强度，以及利润分享等具体措施，将企业由原先的政府机构附属物向自主经营主体转变；与此同时，国家对市场价格、供求关系及宏观调控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松动和转换。体制改革的成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历史的回顾已清晰地显示，80年代的经济改革步伐是以权力下放和利益割让为动力机制的。由于旧体制权利结构的巨大刚性，所以新体制的建立只能依靠对旧体制的表层批判，通过对旧体制的妥协来拓展新体制的生存空间。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80年代改革步伐的快速迈进与下列两个因素是密不可分的，一是改革前我国经济长期高积累所沉积的潜在生产能

力的滞后效应，二是与改革前相比劳动者所得的较大实惠而释放出来的积极工作热情。从推进方式看，整个80年代改革步伐是以行政手段和单项突破为主，政府始终是改革的主导，企业只是改革的被动接受者。因此，整个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各种利益的冲突和摩擦，综合的矛盾积聚已经成为改革的阻碍力量。为此国家不得不收回部分权力，动用各种手段进行全面的“治理整顿”，使改革的步伐进入了相对平稳阶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改革进入了90年代。

9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与80年代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以80年代的改革步伐来评判90年代。从改革的内在机制看，80年代的改革是在“十年动乱”之后整个经济几乎在崩溃的边缘状态下进行的，改革的任务是尽快地打破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模式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步伐之迅速，效应之大，超出了原先的预期。广大消费者在长期的“消费压抑”之后由于收入增加、生活改善而释放出的巨大热情，构成了80年代改革进程中重要的群众基础。更为明显的是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主要集中在国家与企业的权利关系调整上，通过市场取向改造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以此来活跃整个经济。但这种以“放权让利”为推动力的浅层改革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更深层经济改革必须寻找新的逻辑起点和动力机制。显然，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80年代不同，它的重心已不再是打破旧体制，而是建立新体制，这一任务无疑要艰难得多。80年代的改革已将原有旧体制的主要框架打破了，而在这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矛盾、摩擦乃至冲突，都需要90年代来给予解决，所以90年代的改革必须更加坚决、彻底和深层化。但问题在于，潜在的通货膨胀反弹时时威胁着改革步伐的迈进，并且90年代关于劳动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等的改革，由于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其改革的难度和阻力也就较大。相反，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效益却很高。可以说，90年代的改革无论在广度上或深度上都已超越了80年代，并且改革和个人经济权利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了。

当我们在思考影响90年代改革的不利因素时，与困难同时并存的有利因素又激发我们加快改革的进程。首先，80年代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90年代改革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宏观主体对改革的设计和经济调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群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已明显增强；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认识有了较大解放，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更加深入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尤其是市场运行出现了较宽松的环境，这为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将企业推向市场，从而完成中国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

三、90年代加快改革步伐的几点设想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90年代改革目前正进入非常重要的阶段，面对80年代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现今国内外的有利时机，人们迫切要求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通过机制转换和改革的深入发展来使国民经济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结合上述对90年代改革环境的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必须遵循下列具有规则性的特点：1. 连续中的扩张。我国经济改革已走过了几个年头，下一步改革方向及步幅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已经改革的历史，由于经济体制内部存在着相互贯通的逻辑联系，因此改革步伐自身也必须保持相应的连续性质。这就决定了我们下一步改革首先必须总结改革过的环节、矛盾运行及对今后改革的影响，在分析过去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基础上，继承有效的改革经验和措施，使改革保持连贯性。但是，加快改革步伐又不是一个简单的继承过程，而是一个

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张过程。根据我国改革的运行轨迹，搞活企业一直是改革的主导流程，80年代如此，90年代当然也不例外。在我们所走过的改革历程中，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效，改革后经济繁荣的出现也主要依存于这种转换。但这种转换目前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困难主要来自于企业外部协调和保障机制没有转换配套，而这正是今后几年中加快改革的一个重点。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机关成为“公务机构”问题，即政府机关从过去对经济的“行政垄断”主体转变为经济规则的给定和维护主体。二是企业的市场化推进问题，即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企业的生命由其参加的市场交易来决定。这方面的改革要抓住下列三个基本环节：第一，承认企业是产权主体拥有完整的资产配置权利，并通过产权股份化来实现这一过程；第二，改变市场运行中的“行政定价制度”，放开物价，使之由供求关系来综合决定；第三，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商品，从而使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都能通过市场来调节。2. 波动中的稳定。现在不少人担心改革步伐的加快会导致经济的波动和过热状态。实际上，改革步伐自身就是在波动中前进的，没有波动的改革只是人们的美好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稳定，只要波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稳定是可以保证的。尽管我们认为由于改革能量释放的不均衡决定着改革步伐的波动式运行，但这种波动所造成的有关损失毕竟是改革的内在成本，为了降低这一成本，必须对改革步伐进行科学的周密设计，特别是改革决策的民主化。3. 区域差异中的过渡。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从横向的比较来看，各个地区在统一目标导向下的改革步伐具有较大的差异。80年代的改革已经显示了这种差异。一般来讲，影响区域间改革步伐差异的主要因素有：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及其所决定的市场结构类型、人们的观念及开放程度、新旧体制并存格局及其转换速度、政府的政策偏好以及相应的位置。这些因素的不同作用决定了改革步伐的非同步推进。东南沿海和内陆大中城市向市场经济推进的条件成熟得多，改革步伐可以快一些；而不少相对落后的省份，其主要任务是破除自然经济，拓展商品市场，在吸收先进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改革的步伐，切忌在条件不成熟的状况下盲目模仿，只有通过因地制宜、层层推进的方式来形成各地改革你追我赶的局面，才能从总体上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上接第54页）前成本核算的单一化，满足不了企业进行科学决策和有效的控制，因此企业财会不仅要核算产品成本，也应当核算各层次的责任成本，建立同本企业经济责任制相适应的内部核算制度，并健全考核指标体系。此外，为满足不同的需要，也应核算各种形式的成本，如质量成本等。成本核算范围也不仅只限于供产销过程，还应当往前扩展到产品开发设计成本，往后延伸到销售后的服务成本。

4. 由忽视智力投资转到重在培养具有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的财会人员上来。这样

才能适应财会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需要。随着经营责任制的推行，企业一切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活动都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而展开，而要真正实现最佳经济效益，就非得采用现代化经营管理的理论和知识不可。因此，从长远看必须从提高财会人员素质上下功夫，工作质量提高才有希望。随着经营管理的需要，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已成为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要把电算化逐步应用到财会核算中去，这是财会工作的必然趋势。我们着手做准备工作，争取年内部分推行。